



神州大地之子

——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共产党员形象论

李善修 夏家夫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SHENZHOUDADIZHIZISHENZHOUDADIZHI

125
828

神州大地之子

——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共产党员的形象论

主 编:李善修	夏家夫
副主编:王 敏	宋尔康
侯运华	王秀莲

河南大学出版社

神州大地之子

主 编 李善修
 夏家夫
责任编辑 岳耀钦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开封市计委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88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8.00 元

ISBN7-81041-266-3/I·97

执笔人员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汇娟	王秀莲	王 敏	王德军	牛华男
卢秀丽	李善修	宋尔康	张永江	张喜田
侯运华	贺 平	夏家夫	郭新和	

禹王台漫笔

——读《神州大地之子》——
——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共产党员形象论
(代序)

刘增杰

夏日雨后，清风徐徐，善修来访。

我和善修虽然不在一个系工作，但却是相交多年的老相识。因为我大学毕业早他几年，还糊里糊涂地给他上过几节课。所以，在校园里碰面，他总是彬彬有礼，略带几分客气地呼我为“老师”；我则戏称他是“领导”，说他尊我为师，是对知识分子的礼贤下士。平时，我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深谈不多，但相互间始终保持着友好的情谊。这次会面后，善修仍是面含微笑，谦恭地问热问冷，行师生之礼。接着他略带拘谨地告诉我，他和他的朋友写了一本叫《神州大地之子——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共产党员形象论》的书，内容是评论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共产党员形象的，最近就要出版，请我为该书作序。说真话，对于善修研究的课题，我实在思考较少，没有发言权，本想说明实情，加以婉辞。但抬起头来望见他那质朴、和善而又诚恳的神色，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我顺嘴说，让我想一想，试一试。

写点什么呢？我突然忆起近日重游禹王台的印象。禹王台所给予我感情上的撞击，也许竟包含着善修和他的伙伴撰写这部书稿的部分动机。

座落在开封市东南隅的禹王台公园，吸引我一次次去拜谒它的原因是什么？是它所暗含的深厚的文化意蕴。走进公园西门，在

绿树环抱下，映入游人眼帘的，首先是古吹台建筑群正中大门上方苍劲拙朴的三个大字：“古吹台”。相传春秋时期晋国乐师师旷，曾来此鼓吹奏乐。这位音乐天才的演技不仅使当时的聆听者折服，而且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与思念，因而以吹台命其遗址，并建师旷祠，塑师旷像，创造出了一种颇带神秘感的音乐氛围，让游人在这位艺术家面前伫足沉思。建筑群中最为壮观的，当属禹王庙了。传说中的治水英雄大禹，端庄，坚韧，严肃，风尘仆仆地站在大厅中央，一代又一代地向游人传递着民族文化密码，从而使以无私奉献为特色的治水精神，成为数千年来绵延华夏民族的精神支柱之一。禹王庙东侧的三贤祠，则记录了唐天宝3年（公元744年）李白、杜甫、高适同登吹台的盛事。诗风雄奇俊逸的李白，和诗风雄浑严谨的杜甫，以及才思奇纵的高适，在吹台饮酒高歌，慷慨怀古，该是中国诗坛多么值得纪念的时刻。这座小小的貌不惊人的三贤祠，竟包含着何等壮阔的历史内容和令后人赞叹不已的文化精神。

出了古吹台，沿着古柏甬道北行，就到了辛亥革命烈士陵园了。为了响应武昌起义，河南革命志士呼啸而起。以起义军河南军政府总司令兼参谋长张鍾端为首的11位志士，起义失败后从容就义。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在中原大地上镌刻了本世纪第一块丰碑。

漫步禹王台公园，总使我不由地产生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历史就是选择。年代愈久远，选择就愈严格。在禹王台公园里，几千年的历史沧桑，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只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名字。他们活在青松翠柏的掩映里，活在每位有良知的游人的心里，活在丰腴的中华沃土里。他们是真正的神州大地之子。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志士仁人，为民族血脉的延续，从事着较历史上更为复杂，因而也更辉煌的事业。文学创作中所创造的各式各样的角色，特别是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艺术形象，无疑应该受到研究者格外的关注。从这种意义上说，善修他们的努力当然是有意义的。研究这些艺术形象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分析这些形象塑造的

成败得失,将是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一项不可或缺的艺术积累。从思想认识的层面来说,这项研究工作,则有助于青年读者了解昨天,认识今天。因为历史是过去的今天,今天是明天的历史。割不断的文化精神、文化血脉,就深藏于禹王台公园历史人物的风采里,深藏于当代艺术形象一蹙一笑的眼神里。

如果说深厚的文化积淀是禹王台公园的一个突出特色;那么,也不妨这样说,多姿多彩的园林,同样是它的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点缀于公园里的牡丹园、石榴园、樱花园,以及数不尽的苗圃,奇花异木,构成了一个让人目不暇接的花的世界,绿的世界。花木摇曳多姿,以强壮的生命活力,相互依托着,反衬着,对比着,竞争着,向游人呈献出自己独有的风韵。这才是大自然,一个永远浑然天成的大自然。艺术形象的创造和研究亦然。革命者、工农兵、共产党人、变节者、汉奸,各色人等,芸芸众生,都对成功的艺术具有吸引力。或者说,鼓舞艺术家为之献身的,是永不会干涸的艺术形象之海。在这里,只有艺术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失误,而不计较形象本身的重要与高低。就提高现当代文学研究艺术质量论,起决定作用的,当然不在于研究对象属于何类艺术形象,而取决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的状况。思维模式的变革是一个缓慢的、艰难的甚至是十分痛苦的过程。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有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它的超稳定性结构常常使研究者无法保持思想的批判性和独立性,从而诱惑研究者在艺术形象的表层滑行。据我所知,本书作者在更新知识结构、锻炼艺术感受能力诸多方面,都曾经做出过诚实的努力。他们的努力是有收获的。阅读与批评是一种感情的旅行。它既是批评者对原作品感情隐密的探微,又是对时代感情生活的折射或再现,更有着批评者自我精神风格的闪烁。这感情旅行永无止境。我企盼和作者、读者一起,在浩淼的艺海继续远航。

1995 年盛夏

目 录

禹王台漫笔——读《神州大地之子	
——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共产党员形象论》…… 刘增杰	
高大丰满,亲切感人	
——论《地球的红飘带》中的毛泽东形象……………	(1)
伟大的精神,崇高的人格	
——浅谈《地球的红飘带》中的周恩来形象 ……	(10)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论新时期戏剧文学中的陈毅形象 ……	(17)
革命农民的英雄典型——评《红旗谱》中的朱老忠 ……	(21)
文武双全的女英雄——韩英 ……	(30)
心底无私天地宽——析《小城春秋》中的李悦形象 ……	(34)
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林道静 ……	(39)
道是无情亦有情——评《白鹿原》中的鹿兆鹏形象 ……	(47)
党的优秀女儿——黄新 ……	(54)
从女奴到党代表	
——谈谈《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形象 ……	(59)
民族的脊梁	
——《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形象简析 ……	(64)
根深 叶茂 花红	
——根植群众生活深处的老杨同志 ……	(68)
万花丛里一奇葩	

——勇闯新路的高生亮	(75)
智勇双全的孤胆英雄——杨子荣	(83)
一个单纯而丰满的英雄形象	
——《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形象分析	(89)
一个政工干部的楷模	
——析《保卫延安》中的李诚形象	(94)
永远活在群众心中的“头行人”	
——从觉醒到成熟的共产党员赵玉林	(98)
乘风破浪向前进	
——土地革命运动中的领航员肖祥	(104)
忠诚 信念 挚爱——浅析《红日》中的沈振新形象	(113)
“一片丹心向阳开”——评《红岩》中江姐形象的塑造	(116)
在烈火中永生——评《红岩》中的许云峰形象	(123)
钢铁战士郭祥	(132)
永葆青春的共产党员——析《在和平的日子里》阎兴的形象	
.....	(140)
农村干部的艺术典型——老田	(146)
农民的领路人,党的忠实儿子——梁生宝形象分析	(151)
永远的战士——析《延安人》中的老黑形象	(155)
“高尚的圣者与殉道者”——李铜钟形象的社会意义	(159)
人生就争这口气——评《创业》中的周铁杉形象	(164)
巍然屹立的劲松——简析《将军吟》中的彭其将军形象	(171)
无产阶级企业家的典型形象——乔光朴	(176)
今日中国的脊梁——析《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形象	(184)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简析《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陈咏明形象	
.....	(192)
依然闪烁的一颗明星	

——评《新星》中的李向南形象·····	(198)
一个共产党员的反思与发现	
——评王蒙《蝴蝶》中的张思远·····	(207)
平凡而伟大的英雄——梁三喜·····	(215)
具有特殊风韵的英雄靳开来·····	(221)
后记·····	(226)

高大丰满，亲切感人

——论《地球的红飘带》中的毛泽东形象

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作家魏巍，于古稀之年，以他艺术的天才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用整整三年时间，精心创作了一部反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历史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以下简称《飘带》）。作品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是一部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的感人至深的史诗性作品。《飘带》塑造了许多成功的人物形象，特别塑造了显示作品重要艺术成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象。他们个性鲜明，形象逼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作者集中笔墨，着力刻划的则是毛泽东形象。

毛泽东这位二十世纪的伟人，和红军长征有着特殊的关系。由于“左”倾路线对他的排挤，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导致了红军的战略转移，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又由于遵义会议上重新确立了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才保证了长征的最后胜利。毛泽东是和长征共命运的。长征是他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的优秀品质和指挥才能得到充分表现和施展的时期，是他整个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岁月之一。作者以他惊人的眼光和魄力，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多侧面地塑造了毛泽东这一典型形象。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是不乏各个革命时期毛泽东形象的。但多是侧面描写，即使正面描写，也未能展开。有些作品往往把毛泽东神化，将他写成能呼风唤雨，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而《飘带》不但是直接地正面地多侧面描写，而且是将这一形象贯穿始终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既没有把毛泽东神化，更没有故意从他身上去挖掘人性的弱点和内心的阴暗面。他遵照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按照人物的本来面

貌，塑造出了真实丰满、亲切感人的伟大革命领袖形象。既写出了他伟大超群的一面；又写出了他平凡普通的一面。他的伟大不是上天赋予的，是他勤于实践、认真调查研究，总结群众智慧的结果。他虽是伟大，仍是群众中的一员。他同样是血肉之躯，同样有七情六欲，同样是奔流着热血的普通生命。但是他又不是一般的普通人，而是根植于普通人中的英雄。他的普通平凡事迹中常常闪烁着伟大的光辉。作者准确地掌握了艺术的分寸。既没有神化，也没有庸俗化，达到了伟大与平凡的有机融和。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具有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顾全大局，忠于革命的高贵品质。遵义会议前，特别是长征之前，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连遭厄运，几年之中一直处在逆境之中。1931年赣南会议，他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地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者”，迫使他离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到瑞金东华山养病去了。当时他表面无事，实际是人在山上，心却在山下，尤其对正进行的打赣州表现得焦灼不安。当我军处在进攻不成、骑虎难下，项英请他挽回局面时，他对这场本来就不同意的战斗可以不去。但是为了革命，他还是爽快地答应下来，并带着病冒雨出发了。在他正确指挥下取得了一些胜利时，又得了一个执行中央打赣州命令不坚决的罪名。特别是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又批判他的“诱敌深入”的正确主张，给他戴上了“等待敌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大帽子，并撤去他一方面军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当他离开会场回后方时，尽管内心相当激动，但还是从容地站起来跟大家握手，十分大度地说：“好吧，同志们，你们什么时候要我毛泽东来，我就来。”回到后方，他仍担心着革命的命运，期待着“左”倾领导者的觉醒。在瑞金，他极度的孤独痛苦，然并不消极。前方的事不让管了，他就主动到后方去做调查研究。他对中国国情了解如此之深刻，和这段的基本功是分不开的。1933年的第五次反“围剿”，毛陷入了沉重忧虑之中。他忧虑的不是个人得

失，而是苏区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尽管他的正确意见不被重视，一些会议不让参加，他还是殚精竭虑，力图挽救危局。如当时他认为“福建事变”的发生是红军打破被动局面的好机会，便郑重向中央写信，结果石沉大海。后又亲自到中央陈述意见，也毫无结果。因他忖思过度，再次病倒。活跃的虐原虫，使他一连几天剧冷剧热，烧得昏昏迷迷。就在这时，兴国失守。他一得此消息，便立即挣扎着起来了。他身披衣服，手持铅笔，就着灰黄的灯光，深深地俯在地图上筹划着挽救局势的良策。

在革命逆境中，他置个人荣辱于不顾，顺境中，他同样不计个人的得与失。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走上了领导岗位。在遵义大捷和遵义会议鼓舞下，部队士气高昂，统帅部很想再打几个好仗，以便打开局面，决定攻打驻在打鼓新场的王家烈的一个师。统帅部开了半天的会，众口一词地都说是不大不小的一口菜，但毛泽东一个人不同意打。他的意见被否决，决定部队第二天一早出发，但毛回去越想越认为不能打，越想越不放心。晚上再也睡不着了，于是他深夜一个人挑灯找周恩来陈述理由，结果避免了一个大的失误。这时，毛泽东考虑的不是别人对自己会有什么看法，也不是为了照顾大多数同志的面子，而是认为，在革命关键时刻，只要一步棋走错，后果就不堪设想。

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强大的自信力是毛泽东性格的又一显著特征。

毛泽东是一个任何力量都压不烂、拖不垮的坚强无比、充满自信的钢铁巨人。这种性格使他不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在任何强大的敌人面前，处理何等重大问题，都能沉着镇定，无所畏惧，做出果断地决定，显出惊人的胆略和不屈的力量。长征途中，由于历史的巧合，蒋介石决心凭借大渡天险，企图使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为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毛泽东在指挥红军夺取安顺场后又果断地作出迅速夺取红军唯一可以摆脱险境的泸定桥。当刘伯承介绍

说：“听说那桥很特殊，只有那么几根悬空的铁索，架着一些板子，离这里还有整整三百二十里路”时，他果断地说：“那也要夺取！还必须要快！”还对刘伯承说：“我曾做过最坏的打算，即使过不了大渡河，我们就绕到西康去，也决不会学石达开的。”眼里同时闪射着一股极其倔强的蛮劲和不可战胜的光辉。毛泽东的坚强和自信还表现在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为实现与四方面军汇合的战略目标，红军选择了雪山这条道路，但是此山是“要过夹金山，性命交给天”的神山，是只有个别人走过，且大多死在山上，从没有大军走过的危险之路。但毛泽东经过认真权衡还是果断地选择了此路。他认为，只要有人走过，那就是走得过去的，既然少数人过得去，我就不相信多数人过不去！这种屡次战胜强敌和障碍所形成的强大自信，使他决心象鲁迅那样，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毛泽东的坚强和自信更突出表现在，即使革命遇到再大的挫折，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也永远不会在他心中泯灭。在一四方面军汇合后，毛泽东对北进曾有一番宏阔壮丽的想象，他计划以十万雄师，北进甘南，只要一旦离开那恼人的地区，就会象蛟龙入海，纵横飞腾，有声有色地大干一场。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我们带出来的人数不过七八千人，比起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只不过是当初的零头。中国革命遭受的这种严重损失，对毛泽东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这种打击对一般领袖人物是难于承受的，但毛泽东这块压不烂打不碎的铁，这个中华民族的硬骨头，并未对革命失去信心，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领导，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他无比坚毅地说：“我们即使被敌人打散，我们还可以做白区工作，我们还可以领导义勇军，我们最终是会胜利的。”毛泽东这位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心中那团熊熊革命之火，永远不会熄灭。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不仅表现在顾全大局忠于革命的品质和坚定乐观的革命精神，而且还表现在他那超人的智慧和政治远见上。他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有精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

娴熟运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能力，在这方面，不仅那些自称为“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者”无法相比，就是在他的战友们中间，也是出类拔萃的。尽管大家都拥有同样的客观材料，而他却有更多的辩证的思维。他不是孤立地观察一个条件，而是把这个条件同其他条件联系了起来；他又不是静止地看一个部分，而是从变化中看他的结局，因而他能从表面现象更深刻地看到事物的本质，从现在较早地预见到未来。长征途中，他见微知著，高瞻远瞩，最深刻地从敌人的貌似强大中看到它的虚弱本质；从红军的暂时弱小中发现生长着的不可战胜的因素。他从湘江悲剧中看到了其中孕育着的辉煌转机；遵义会议后，又从指战员高昂的情绪中冷静地预见到打鼓新场战斗可能失败的结局。他常常能最早从困境中发现红军的出路，他又独具慧眼地在我们的胜利中看到潜在的危机。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更显出他惊人的机智。红一、四方面军在双河口会师后，张国焘违抗中央关于北上的方针，坚持南下西康，为推动这位数万人之首的张改变错误主张，毛泽东同他进行了十分巧妙地斗争。张国焘有个特点，从表情上很难看出他的真实态度，从他的谈话中也太容易看出他的真实意图。他的话拐弯抹角，有时模棱两可，有时含糊糊，使你莫测高深。如果你是一个脑力不太强健的人，不一会儿就会使你陷入语言的迷宫，把你弄糊涂。对此，毛泽东是含而不露，棉里藏针，表面显得十分松弛，内心却睁着明亮的眼睛，他不断地拨开语言的迷障，力图抓住主要的东西。同时，为达到最终目的，他还十分讲求斗争艺术：或在“国焘”、“国焘同志”等亲切的话语中，蕴含着严肃的批评；或通过正面阐述自己主张的方式来否定对方的错误意见；或借用张发言中的某一点加以发挥，形成批判论敌的武器。

最能表现毛泽东的智慧和政治远见的，是他的军事才能。

毛泽东是天才的军事家，他根据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相结合，创造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这种思

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军事遗产的结合，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继承了中国革命战争历史传统而民族化了的的思想。它是马列主义的，又是中国的，是马列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长征途中，毛泽东运用这种思想，战胜了外部的敌人和内部的机会主义者，教育和团结了广大同志，保证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军事理论家、战略家，而且还具有无与伦比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深谙军事战略，善于从客观上把握战争全局。他料事如神，出奇制胜，在敌我力量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指挥红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他有一种奇才，越是在困难和被动的环境中，往往出现一种奇思，常能出敌意外，有时连自己人也意料不到。二渡赤水就是他军事指挥上的神来之笔。红军在乌蒙山下，扎岭之西稍作喘息，敌情便日趋严重：川军以潘文华为总指挥的十几个旅，滇军以孙渡指挥的四个旅，中央军的周浑元纵队和黔军的何知重等，分别从四面凶恶逼来，对红军形成一个四面包围之势，妄图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横江以东、赤水以西，兴文、叙永以南，毕节、镇雄以北的地区内。当时我军是扎西已不能守，因敌人企图把我们聚歼在这里；北渡长江也不可能，那里有敌军三十多个旅严密封锁，只有遵义地区敌兵空虚。红军处境万分危机，统帅部开会讨论了一次，未得出最后结论。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在苗家一座简陋的小木楼上，闭门拒客，扪虱苦思，以他特有的天才，终于作出了一篇二渡赤水，再取遵义的奇文。这个回马枪不仅使红军摆脱了绝境，而且在遵义又狠狠咬了敌人一口，从而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作者在集中刻划毛泽东伟大性格的同时，又将笔触深入到其他领域，刻划了他平凡的一面。毛泽东是指挥千军万马、从容镇定的统帅，又是一个深情体贴、惦念妻子的丈夫。毛泽东和贺子珍早在井冈山时代就是一对亲密的伴侣和战友。后来，在毛泽东坎坷的革命征途中，贺子珍对他体贴入微，全力支持。长征途中，贺连遭不幸，生命垂危，毛对贺深切同情，关怀备至。作者放开手脚大胆地淋

滴尽致地写了毛、贺之间的夫妻之情，写了毛泽东的痛苦和眼泪。长征一开始，毛对患有肺病，且有身孕的贺一直放心不下，担心她行路艰难，更怕她生在途中。最忧虑的事发生后，他看到产后的贺子珍睡在担架上，脸色惨白，眼睛微闭，身上盖着一床灰色军毯，已被细雨打湿，脸上盖着一顶斗笠，也满是雨水，担架下面还在扑嗒扑嗒地滴着什么时，心里一阵痛楚，怜惜之情油然而生。他立刻让小沈从马褡子里拿出自己的毯子和一条毛巾来，他亲手把那条湿毛巾解掉，包上一块干的，随后又把湿的毯子揭出，把自己的毯子盖在里面，湿毯子仍旧盖在表面，一切都做得那么妥贴细微。同时又轻轻寻问，亲切地安慰，使贺子珍惨白的脸上，漾出一层幸福的红光。特别突出的是在贺遭到敌机轰炸受重伤后，毛一得知消息，便飞马赶来，当他看到受伤惨重、昏迷不醒、脉息微弱、生死未卜的妻子的情景时，尽管他以强大的意志力控制自己，人们还是发现这位在千军万马中从容镇定的统帅，脸色渐渐变得苍白。在贺因夹取弹片，引起过度疼痛，在昏迷中猛地哎哟了一声时，毛轻轻咬着嘴唇，额头上又渗出了几粒细小的汗珠，同时流下了一生中少有的眼泪，这眼泪和汗珠是他见到自己年轻的妻子，在那难堪的生育之后，又遭此大难所引起的难以形容的心里绞痛的反映。但是，毛泽东并不象一般人那样为这痛苦所压倒，而是很快把这种感情转化为对敌人烈火般的仇恨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他充满强烈感情，十分激动地说：“让他们炸吧，让他们剿吧，让他们堵截吧！我可以告诉他们，就是再加上几十万人，也挡不住我们红军北进。”

毛泽东还十分关心同志，善于团结同志，对同志有深厚的革命情谊。他关心他的伟大战友周恩来，为保证他的休息，提出给他配担架，他为周的病情而焦虑万分；为解决洛甫同志的“凄凄惨惨戚戚”，他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了洛甫和刘英的结合；他十分关心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三位革命老人，担心他们因年老体弱而出问题。他还关心其他同志，特别是对休养连指导员李樱挑的关心更是感